



传习录

王阳明 著

叶圣陶



点校

时代书局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传习录

王阳明 著

叶圣陶 点校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传习录 / (明) 王阳明著; 叶圣陶点校. --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4.5
ISBN 978-7-80769-586-8

I. ①传… II. ①王… ②叶… III. ①心学—中国—明代 ②《传习录》—研究
IV. ①B248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6865 号

传 习 录

著 者 | (明) 王阳明
点 校 | 叶圣陶

出 版 人 | 田海明 朱智润
选题策划 | 赵省伟
责任编辑 | 徐敏峰 周海燕
装帧设计 | 程 慧 赵芝英
责任印制 | 刘 银
营销推广 | 赵秀彦 孙向雷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120 64267397

印 刷 |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010-87331056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695mm×995mm 1/16

印 张 | 19.5

字 数 | 327 千字

版 次 |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80769-586-8

定 价 | 3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绪言

一、传习录

《传习录》是王守仁的弟子们记录老师的学术讲话及论学书信的集子。曾子说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所谓“传”，是从老师传授下来的。“习”是把承受的“传”来熟习。《传习录》题名的取义，就是从这上头来的。最先做这工作的是徐爱，他是守仁最得意的弟子，可惜早死。薛侃得他的遗稿，在虔刊行，是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事，守仁四十七岁。后南大吉续刻于越，增入他自己及同门收集的守仁的论学书信，时在嘉靖三年（1524），守仁五十三岁。今本《传习录》共分三卷：上卷是徐爱、陆澄、薛侃所记。中卷是论学书信。下卷是好几个门人所记，钱德洪所编定。据钱德洪跋文，末书嘉靖丙辰（1556），其时距守仁的死已二十多年了。中卷也经德洪增损，又改为问答体，看他的题记可以知道。

二、王守仁

王守仁，字伯安，余姚人。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（1472）。父名华，字德辉，成化辛丑进士，仕至南京吏部尚书。守仁幼年读书，问塾师说：“何为第一等事？”塾师说：“惟读书登第耳。”守仁觉得疑惑，说：“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，或读书学圣贤耳。”他的父亲听见了，笑说：“汝欲做圣贤耶？”年十五岁，游览居庸三关。边塞的风物，防御的设备，给予他深深的印象，因而引起经略四方的志愿。十八岁，谒娄谅于广信。娄谅是一位笃实的儒者，给他讲宋儒“格物之学”，以为圣人可学而至。于是开始做格物的工夫，遍求朱熹的遗书来读。一

天，忽然想起儒者所说众物必有表里精粗，一草一木，皆涵至理，便对着庭中竹子去“格”，要沉思出它的理。结果是一点理也没有悟得，反而患了病。便相信圣贤自有定分，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，因此改做辞章之学。二十六岁，再到京师。其时边报很急，他受着影响，博览兵家的书籍，但是不多时就烦闷起来，以为辞章艺能都不足以通至道；要想访求有益的师友，又很少碰到。心头郁悒不得开展，旧病重又发作。偶然从道士谈及养生，便想遗世入山。二十八岁举进士，赐观政工部。其时边患很厉害，他上边务八事，说得非常剴切。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。奉命录囚江北，多所平反。事罢复命，见京中一班旧友专治诗古文辞，互矜才名，因叹说：“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！”就告病归越，筑室于阳明洞中，行导引术。不多时悔悟说：“此簸弄精神，非道也。”重又屏去。可是学道的念头并没有抛却，总想脱离世俗，飘然远去，只因舍不得祖母同父亲，因循不决。好久，忽又觉悟，以为“此念生于孩提，此念可去，是断灭种性矣。”于是渐悟仙、释二氏之非，反过来又想入世。青年期的王守仁，到这里差不多成一段落。在这个段落里，他努力地追求，总想得到个安身立命的所在，把全生命沉浸在里头。这样厌倦了换那样，那样不满足又另换一样，任侠，骑射，辞章，神仙，佛氏，他样样都来。但是没有一样足以使他安身立命的，都只报答他一个烦闷。

三十三岁，主考山东乡试，试录都出他的手笔。从此，世人方才知他的经世之学。明年到京，对于时下沉溺于辞章记诵的一般人竭力提撕，教他们做修养身心的工夫，立下必为圣人的志向。这是他一生中聚徒讲学的开场。但是与习俗不相合，便得了“立异好名”的讥谤。明年，宦官刘瑾专政，南京科道戴铣、薄彦徽等进谏，即被矫旨逮捕下狱。守仁上疏援救，也就得罪下狱，廷杖四十，既绝复苏，未了迁谪为贵州龙场驿驿丞。行至钱塘，觉察有刘瑾的人跟随在后，意欲谋害，便假作投江自尽，乘着船想就此远遁。后恐怕累及父亲，仍旧登程，到了龙场。龙场在万山之中，毒虫瘴气，到处都是，几非生人所堪。其地又没有居室。与土人相见，言语不通，可以共语的，只有些中原亡命之徒。像这等遭遇，戟刺是受足了，痛苦是尝够了，如是平常的人，免不了就此颓丧下去，自认命中注定是恶魔的俘虏，但在非常的人却不然，甚深的戟刺和痛苦往往就是新生活开始的序幕。他自然不是平常的人，处这境界，先自超脱一切得失荣辱的念虑，日夜端居澄默，以求静一。后来觉得胸中洒然，连先前不能摆脱的生死一念也不复

相牵累。因此觉悟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，从前求理于事物之间是不对的：这就立定了他对于“格物致知”的见解。又默记五经里头的话来印证，觉得都相吻合，乃作《五经臆说》。三十八岁，始论“知行合一”。明年，刘瑾伏诛，升任庐陵县知县。从此门人渐多，时时有所讲习，也时时有所阐发。从前的烦闷再也不来扰他的心曲，多年的追求已经得到了归宿，他归宿于儒家，归宿于唯心的理想主义。此后的生命就准对着这方向走去，不复徘徊。

到四十五岁，他的官阶已历史部主事员外郎郎中，升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，其时闽境巨寇为患，兵部尚书王琼特举他为左佥都御史，巡抚南赣兵事是他从前留心过的，到此着手实做，便平定漳南、横水、桶冈、大帽、浰头许多地方的盗寇。他给这些地方的人举行乡约，勉励大家要敦习礼让。又兴办社学，让他们的子弟受教育。四十八岁，因福建军人谋叛，奉命往勘。行到中途，听得宸濠谋反，便回船到吉安，起兵声讨。宸濠是武宗的叔叔，他这一宗世世要想起来争夺“皇帝”这件宝物，到他手里才算做了出来，在南昌起兵。守仁接战，终于把宸濠擒住。宸濠笑说：“此我家事，何劳费心如此！”但在当时，这自然是一件大功，守仁就被封为新建伯，升南京兵部尚书。他在兵中，总理一切军务，案牍纷繁，终不废讲学。因为经历许多患难，对于平日的见解，更觉体认得真切。五十岁的那一年，开始揭出“致良知”之教，以为这是儒家的真法门，简易明白，只是沉埋了好久，现在却重又发现了。他说：“近来信得‘致良知’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。往年尚疑未尽，今自多事以来，只此良知无不具足。”他又说：“我此‘良知’二字，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。”他又说：“某于此良知之说，从百死千难中得来，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。”从这些话，就可以想见他水到渠成，心地充实，一种怡悦的光景了。五十六岁，奉命往征思田。思田远在西南边隅，其地土官仇杀为乱。明年就平定了，用的是安抚的方法。归途病作，在南安停下。门人周积奉侍在旁，问可有什么遗言。守仁微笑地说：“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！”就死了。这可见他的造诣是终身受用着的，临死还表现出他有非常的修养。这一年是明世宗嘉靖七年（1528）。

他的门人非常之多。当集会讲论的时候，歌声相和，互为问答。像这样真情流露的环境，给予同人以无量的人格感化。及他死后，门人还是集会讲习，阐明他的遗教；又往往在他所经历的地方建立祠堂，岁时奉祀。他虽然不是宗教家，却有教主那样感动人们的力量，他的学说也差不多被看作一种教义：受人崇

奉，也受人排击。在门弟子及后来治王学的人中间，确然有许多践履笃实，学问可观的人；但也有专事谈论心法，只顾调息默坐，嘴里嚷着圣贤，操行却并不讲究的，这是所谓“王学末流”了。

三、王学

王学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这样回答：王学是人生哲学，是唯心的理想主义的人生哲学。

本来儒家的学说，自从孔子起，就有偏于人生哲学的倾向。言人生哲学不能不论修养，言修养自然要探讨到心性。孟子荀子所以都有关于心性的意见。自从东汉时佛教传入，经六朝到唐，流布极盛。其中禅宗一派，不立言诠，不重仪式，专以明心见性为教义。别一方面，道家研究老庄周易，参详太极图，则侧重于宇宙观的探讨。宋儒受着这些的影响，便产生出儒、禅、道混合的理学。到朱熹、陆九渊，理学分为显然的两派。朱熹主张“道问学”，须就天下之事物，一一穷极其理。陆九渊主张“尊德性”，只要修养得这个心正了，就什么都完成了。朱熹自然也不废向内的工夫，可是他一生勤恳地注释古书，研究学问，很显然是偏重于“道问学”向外的一边。陆九渊却完全向内，以为心即是理，理即是心，更不用向外面事物上去求什么理。后来因为朱熹的著作极多，他所注解的书风行天下，他的教义差不多就成为国教，读书人研究和信奉，若非他的教义几乎就是异端。到了明朝，又因同姓的关系，尤其推崇朱熹。照朱熹这样做学问，假若是没有统摄力的人，这方面也要去钻研，那方面也要去考求，结果极容易流入支离破碎的弊病，同时把为学同修养拆开了。又，政治势力作一派学说的护法，就使一般的人奉命惟谨，再不想挺直身子自己去辟道路。所以崇朱的归结，是养成些恭顺附和的人，思想界现出萎靡的气象。但是，这等情形，在生命力极丰富，努力要追求充实生活的人是非常不满的。王守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：在从事追求，未得归宿的当儿，当然要入了朱熹的藩篱而不能安居；在自求有得，立定脚跟的当儿，当然要归入陆九渊的一边。他是竭力提倡陆学的，以为惟陆学直接孟子之学。又曾力辨陆学与禅学不同。陆学的少有人称道，他非常感慨的。到这里，我们可以结束说，守仁的学说是对于当时思想界的反抗；它的源流是陆学，所以后来就并称“陆王”；它所受到影响的是禅与道，虽然他早年曾好仙佛而后

来舍弃了，但实在宋以来的儒家，因为时代的关系，没有不受禅与道的影响的。

四、王学大概

守仁的学说有他的最先的大前提，此外诸说，都从这大前提演绎出来：这就是“心即理”的观念。这观念陆九渊阐发得极详尽，守仁即直承他的系统。所谓“理”是什么呢？就是原则，规律，也就是至善。他们承认宇宙所以存在，所以维系，全由于有这个“理”。天地万物本为一体，所以人心所具的也就是这个“理”。理是整个的，不可分析的，人心既具理，自然具有它的整个，不是一枝一节，所以完全肯定地说“心即理”。

伦理上的最高究竟不是求达所谓“至善”么？而至善就是理，理又为人心所固具，那不是绝无问题，人人都是绝对的善人了么？将怎样去解说世间那些有形迹可见以及无形迹可见的恶人？于是他们更承认有所谓“私欲”，这是遮蔽“天理”的（加个天字更显明人与天地万物一体）。恶人的恶，以及平常人的不能达至善，都是这“私欲”在那里作祟。这就来了做工夫的法门，守仁说：“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。”他屡次把明镜来比喻此心具足天理，把染在明镜上的灰尘来比喻私欲。可见所谓“去人欲”，犹如拭去灰尘；拭到净尽，镜子完全明澈，还它本来面目，犹如人欲去尽，此心还复到“心即理”的本来面目。他主张至善只求诸心，是这样的意思。

他说“知行合一”，也是根据“心即理”的观念。惟其心即理，故凡有所应接，同时发生一种迎拒的力量，或迎或拒，都任自然，而绝没有不得当的。他说：“《大学》指个真知行与人看，说‘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。’见好色属知，好好色属行；只见那好色时，已自好了，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。闻恶臭属知，恶恶臭属行；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，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。”这里有可以注意的：这所谓“知”，与知识、知解等不同，它是无待修习的；它具有热而动的情意，所以知了便好，知了便恶——同时就是“行”；这“知”与“行”又一定是当的，因为都源于心，而心就是“理”。倘若有人以为守仁所谓“知”就是通常的“了解”，“行”就是通常的“履蹈”，那是完全不对的。照他的意思，知行简直是一件事，说知又说行，不过从一般人说罢了。他说：“知之真切笃行处即是行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。”又说：“若会得时，只说一个知己自有行在，

只说一个行己自有知在。”都是说明知行本来合一，无可分割的。

知行合一的境界当然是最好的，如何能达到它呢？守仁的意思以为论理是人人本能够达到的。因为人人有个心，“知是心之本体，心自然会知”；而知即是行。“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，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。”私心的本体，回复个明澈的“知”。“知”一回复，笃实的行是不用说的，当然一存而并存。他说：“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，得以充塞流行，便是致其知。知致则意诚。”这个“意诚”，正就是他所称“行”字的解释。这话不是明明表示一存并存的意思么？

到这里，自然见得人生修养只有一条路，便是“致知”；换一句说，便是“胜私复理”。所以他在五十岁的一年，把许多涵义相近似的术语都不用了，把这样那样的说法给凝炼了，归结到极简约，极扼要，揭出“致良知”之教。其实他先前已经感觉到这层，劳唇费墨，也无非是这个意思；不过还不相信这么一点点就算了。直到这时，才信这个以外再没有别的。所以说：“往年尚疑未尽，今自多事以来，只此良知无不具足。”

我们如要把守仁学说的大要简单地述说，就是这样：他相信心的本体是纯乎天理的，良知充塞流行的；有感斯应，无物不照，故又是知行合一的。障碍本体的东西时私欲。因有私欲，所以天理昧了，良知昏了；感不真，应不切，甚至没有知行可言了。如何可以去私欲呢？只有致良知。致得良知，就是复归本体，而本体原是没有私欲的。

五、余语

王学在我国思想史上是一大支，在人心上发生过极大的影响，我们当然要知道它。这部《传习录》，是守仁学术讲话及论学书信的集子，无疑地，是了解王学最切要的材料。在守仁的全部著作里，《传习录》只占六分之一，其外他的诗文案牍，也灌注着他的学说的精神，而且更寄托着他处事立功的实绩。然而《传习录》却完全是哲学的，思想的，所以说它最切要。当阅览的时候，如其先自立下一个条目，把各则分隶各目，比观通览，必能认识得真切且详尽。——研究关于思想学术的书籍，这是不祧的一法。

王学当然极能影响到我们的修养。如人与万物为一体的观念，止至善的观

念，都把个人看得极崇高，教人去追求精神生活。伟大的人格，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，这种的培养是很重要的。又，知行必须合一，“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”，这“知”又不是“了解”，这“行”又不是“履蹈”：这是教人勿下转念，勿为这般那般的顾虑，而且要始终持之以诚。伦理的见解会因时代而有转变，有些德目会从黄金化为泥土，但是像守仁所想象的这个“诚”，内与外一致，动机与效果一致，却永久是有价值可宝贵的。我们能“诚”么？正不妨自为省问，更自为奋励呢。

至于那个大前提“心即理”是或否，“良知”这件东西有或无，都是问题。大概这些偏于信仰方面，正负两端都不能折服其他的一端。编者无所见，不能述及。

关于详细的研究及王门诸家的概要，可看《明儒学案》。

绪言

一、传习录 / 1 二、王守仁 / 1 三、王学 / 4
四、王学大概 / 5 五、余语 / 6

上卷

徐爱录 / 1 徐爱跋 / 24 陆澄录 / 25 薛侃录 / 67

中卷

钱德洪序 / 101 答顾东桥书 / 103 答周道通书 / 131
答陆原静书 / 139 钱德洪跋 / 156 答欧阳崇一 / 156
答罗整庵少宰书 / 163 答聂文蔚 / 171 训蒙大意
示教读刘伯颂等 / 186 教约 / 188

下卷

陈九川录 / 191 黄直录 / 204 黄修易录 / 212 黄
省曾录 / 219 钱德洪录 / 225 钱德洪序 / 257 黄
以方录 / 258 钱德洪跋 / 275

王阳明先生图谱

徐爱录

先生于《大学》“格物”诸说，悉以旧本为正，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^①。爱始闻而骇，既而疑，已而殚精竭思，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，然后知先生之说，若水之寒，若火之热，断断乎“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”者也^②。先生明睿天授，然和乐坦易，不事边幅。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，又尝泛滥于词章，出入二氏之学^③，骤闻是说，皆目以为立异好奇，漫不省究。不知先生居夷三载，处困养静^④，精一之功，固已超入圣域，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。爱朝夕炙门下，但见先生之道，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，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。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：十余年来，竟未能窥其藩篱。世之君子，或与先生仅交一面，或犹未闻其警欬，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，而遽欲于立谈之间，传闻之说，臆断悬度。如之何其可得也！从游之士，闻先生之教，往往得一而遗二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^⑤。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，私以示夫同志，相与考而正之，庶无负先生之教云。门人徐爱书^⑥。

【注释】

①《大学·礼记》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。郑玄曰：“《大学》者，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。”唐人已有《大学》专本。北宋时，与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并为四书。程颐谓为“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”。朱熹为之作注，称《大学章句》，则区全篇为经一章，传十章，并记之云：“旧本颇有错简，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，别为序次如左。”而以旧本为误本。《大学》有“致知在格物”一语，朱熹注云：“格，至也。物犹事也。穷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极处无不

到也。”又补释“格物致知”之义曰：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大学始教，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；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此谓物格，此谓知之至也。”此说也，守仁抵之。

②“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”，语出《中庸》；言垂法于后，堪以俟待后之圣人，虽远至百世，其道不异也。

③二氏之学，言释与道也。按守仁门人钱德洪诸人所为年谱，守仁至二十七岁，始“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”，至三十一岁，“渐悟仙、释二氏之非”。

④明武宗初政，宦官刘瑾专权，南京科道戴铣等以诤谏得罪。守仁抗疏救之，亦得罪，谪贵州龙场驿驿丞。以正德三年春至龙场，五年升江西庐陵县知县。其在贵州，为始论“知行合一”之时。

⑤昔九方皋相马，观其精而不措意于牝牡骊黄。此处言见其粗而弃其精也。

⑥徐爱，字曰仁，号横山，余姚人。从守仁游，守仁器之，妻以女弟。举正德进士，历官南工部郎中。守仁良知之说，学者初多未信，爱疏通辨析，畅其指要。年三十一卒，守仁哭之恸。

【译文】

先生对于《大学》关于“格物”的学说，都以旧本为依据，旧本就是先儒所说的错误版本。我开始听说时十分惊骇，继而感到疑惑，然后竭力思考相互比对，并询问先生，才明白先生的学说，如水的清寒，火的热烈，绝对是百代之后的圣人也不会怀疑的。先生天生睿智，又和气乐观，坦荡平易，不在意小节。旁人见他年少时豪迈不羁，又曾沉溺于诗词文赋，出入于佛道两家。突然听闻他的学说，都会认为是标新立异，不会深入探究。他们不知道先生在贵州偏远地居住了三年，在困境中修养平静，“精一”的工夫，已经超然进入圣域，回归正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。我终日在先生门下请教，但见先生的学说，刚开始接触时似乎很容易，研究起来会发现很高深。表面上看很粗略，深入探究会发现精深。初接触会觉得很平常，学习起来才发现没有止境。十多年来，我竟然还没能入门。如今的学者，有的与先生只有一面之缘，有的从未听过先生的言谈，有的事先怀有轻视激愤的情绪，仓促地想要根据三言两语、传闻流言来臆断揣度，这样

怎么能领会先生的学识呢？门生们聆听先生的教导，往往领会的少而遗失的多。就好像鉴马的时候只根据马匹的外貌，而看不到它作为千里马的特点。因此我详细记录平日的见闻，私下给同行学者们看，互相考证，希望不辜负先生的教诲。学生徐爱作。

爱问：“‘在亲民’，朱子谓当作‘新民’，后章‘作新民’之文似亦有据。^①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‘亲民’，亦有所据否？”

先生曰：“‘作新民’之‘新’是‘自新之民’，与‘在新民’之‘新’不同，此岂足为据！‘作’字却与‘亲’字相对，然非‘新’字义。下面‘治国平天下’处，皆于‘新’字无发明。如云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’，‘如保赤子’，‘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’之类，皆是‘亲’字意。‘亲民’犹《孟子》‘亲亲仁民’之谓^②，‘亲之’即‘仁之’也。‘百姓不亲’，舜使契为司徒，‘敬敷五教’^③，所以亲之也。《尧典》‘克明峻德’便是‘明明德’，‘以亲九族’至‘平章’‘协和’便是‘亲民’，便是‘明明德于天下’^④。又如孔子言‘修己以安百姓’^⑤，‘修己’便是‘明明德’，‘安百姓’便是‘亲民’。说‘亲民’便是兼教养意，说‘新民’便觉偏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《大学》篇首云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朱熹《章句》据程子曰：“亲，当作新。”注云：“新者，革其旧之谓也。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当推己及人，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。”“作新民”系《大学》引《康诰》语。

②《孟子·尽心篇》云：“孟子曰：‘君子之于物也，爱之而弗仁；于民也，仁之而弗亲。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’”

③见《书·尧典》。

④《书·尧典》云：“……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。……”峻俊通假，大也。平章百姓，言百官之氏族分别章明也。

⑤见《论语·宪问篇》。子路问君子，孔子答以“脩己以敬”“脩己以安人”而殿以此语。

【译文】

徐爱问：“所谓‘在亲民’，朱熹先生说应当是‘新民’，后面章节‘作新民’的文句中似乎也有依据。先生认为应该跟从旧版本的‘作亲民’，有什么依据吗？”

先生说：“‘作新民’的‘新’，是自新之民的意思，与‘在新民’的‘新’不同。这难道不足以为依据吗？‘作’字和‘亲’字相对，但不是‘新’字的意思。下面‘治国平天下’之处，对‘新’字都并无说明。比如说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’、‘如保赤子’、‘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’，都是‘亲’字的意思。‘亲民’犹如孟子说的‘亲亲仁民’，‘亲之’就是仁爱。百姓不仁爱，舜于是任命契为司徒，让他‘敬敷五教’，来让他们互相仁爱。《尧典》中的‘克明峻德’就是‘明明德’，从‘以亲九族’到‘平章协和’，就是‘亲民’，也就是‘明明德于天下’。又比如孔子说过的‘修己以安百姓’，‘修己’就是‘明明德’，‘安百姓’就是‘亲民’。说到‘亲民’就兼有教诲和养化的意思，说‘新民’就偏颇了。”

爱问：“‘知止而后有定’，朱子以为‘事事物物皆有定理’^①，似与先生之说相戾。”

先生曰：“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，却是义外也^②。至善是心之本体，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。然亦未尝离却事物，本注所谓‘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’者，得之^③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“知止而后有定”，《大学》语。止，所止之处，指至善也。言知所止则有定向也。朱子注即物而穷其理，固以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为前提也。

②义外之说，发自告子。《孟子·告子篇》：“告子曰‘食色，性也。仁，内也，非外也。义，外也，非内也。’”孟子与辩，则明仁义俱在内。此处取义外为言以明至善不在事事物物上也。

③朱熹注解《大学》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句曰：“言明明德新民，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。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徐爱问：“‘知止而后有定’，朱熹先生认为事事物物都能达到至善，这似乎与先生的学说相悖。”

先生说：“在事事物物上求至善，就是把义放在人心之外了。至善是心的本体，只要‘明明德’到了最为精一的地步就是了。然而也从没有脱离客观事物，朱熹先生注的所谓‘穷尽天理的极限而没有分毫私欲’的人，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。”

爱问：“至善只求诸心，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。”

先生曰：“心即理也。天下又有心外之事，心外之理乎？”

爱曰：“如事父之孝，事君之忠，交友之信，治民之仁，其间有许多理在，恐亦不可不察。”^①

先生叹曰：“此说之蔽久矣，岂一语所能悟；今姑就所问者言之。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，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，交友、治民不成去友上、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：都只在此心。心即理也，此心无私欲之蔽，即是天理，不须外面添一分。以此纯乎天理之心，发之事父便是孝，发之事君便是忠，发之交友、治民便是信与仁。只在此心去人欲、存天理上用功便是。”

爱曰：“闻先生如此说，爱已觉有省悟处。但旧说缠于胸中，尚有未脱然者。如事父一事，其间温清定省之类^②，有许多节目，不亦须讲求否？”

先生曰：“如何不讲求？只是有个头脑，只是就此心去人欲、存天理上讲求。就如讲求冬温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；讲求夏清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；只是讲求得此心。此心若无人欲，纯是天理，是个诚于孝亲的心，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，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，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，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，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。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，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；譬之树木，这诚孝的心便是根，许多条件便是枝叶，须先有根，然后有枝叶，不是先寻了枝叶，然后去种根。《礼记》言‘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有和气，有和气者，必有愉色，有愉色者，必有婉容’。^③须是有个深爱做根，便自然如此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盖爱以为事父、事君等为心外之事，孝与忠等为心外之理也。

②《礼记·曲礼》云：“凡为人子之礼，冬温而夏清，昏定而晨省。”言冬日则温，以御其寒，夏日则清，以致其凉，昏则定其衽席，晨则省其安否也。

③《礼记·祭义》篇语。

【译文】

徐爱问：“至善只在心中探求，恐怕对于天下事理，不能穷尽吧？”

先生说：“心就是理。天下哪有心外的事和理呢？”

徐爱说：“比如侍奉父亲的孝道，侍奉君主的忠诚，结交朋友的诚信，治理臣民的仁慈，这中间就有许多理。恐怕也不能不细究吧？”

先生感叹道：“这种说法蒙蔽人已经很久了，哪能一句话就得清楚呢？如今姑且就你所问的解释一下。比如侍奉父亲，不能从父亲身上寻求孝顺的道理。侍奉君主，不能从君主身上寻求忠诚的道理。结交朋友、治理臣民，不能从朋友和臣民身上寻求诚信和仁慈的道理。这些道理都只在人心之中，心就是理。人心没有私欲遮蔽，就是天理，不需要从外界增添分毫。这种内心纯粹的天理，表现在侍奉父亲上，就是孝道；表现在侍奉君主上，就是忠诚；表现在结交朋友、治理臣民上，就是诚信和仁慈。只要在内心中下工夫摒除私欲、存养天理就可以了。”

徐爱说：“听先生这么解说，我已经有所省悟。但从前的观点萦绕心中，还有没能释然的地方。比如侍奉父亲的事，其间冬温夏清、晨昏定省之类，有许多细节，不也需要讲求吗？”

先生说：“怎么能不讲求呢？只是要有个主次，只是在内心摒除私欲、存养天理上讲求。就比如讲求冬温，也只是要尽孝心，惟恐有丝毫私欲夹杂其中。讲求夏清，也只是要尽孝心，惟恐有丝毫私欲夹杂其中。只是讲求有这份心，这份心如果没有私欲，纯粹是天理，是颗诚挚于孝顺亲人的心，冬天自然就会思量父母的寒冷，便自然要去寻求温暖。夏天自然就思量父母的暑热，便自然要去寻求清凉。这都是那颗诚挚于孝顺亲人的心生发出来的条件，但却必须先有这诚于孝顺的心，然后才有这些条件表现出来。以树木比喻的话，这诚于孝顺的心就是根，行为上的表现就是枝叶。必须先有根，然后有这些枝叶，不是先找到枝叶，然后再去种根。《礼记》说的‘有深切爱心的孝子，必定有和悦的气度。有和悦